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二三期 ——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1b)

【亡灵祭坛】以日记获罪致死的语文教师：陈沅芷之死	王友琴
【研究动态】健全民族的记忆——文革研究资料编印纪实	亓冰峰
【史海钩沉】谈林彪“一号令”	张云生
【学术争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阶段 应该界定在 1966—1969 年恰当	颜智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亡灵祭坛】

以日记获罪致死的语文教师：陈沅芷之死

• 王友琴 •

陈沅芷，女，1924年生，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8月底，第二十五中学红卫兵抄了陈沅芷家。她的日记被抄走。红卫兵说日记中有“反动言论”。陈沅芷被抓到学校中关押在那里。后来，1966年9月8日，陈沅芷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校中被打死，时年42岁。

陈沅芷1958年调入北京第二十五中学，1966年被打死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学校教书8年。

第二十五中学位于北京东城区，离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很近。这个学校原名“育英”，在1950年代改名。在文革中，第二十五中学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之一，也一直是北京红卫兵的主要力量之一。

1966年8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作“红八月”，因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发展和行动的

一个月。他们所说的“红”，是指革命。但是，如果贴近看事实，这“红”是人血。红卫兵的暴力行动从8月初开始大规模进行。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控制了各个学校，包括指挥车辆和占据学校广播室。红卫兵的暴力行动的最早的攻击对象是学校的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然后，在8月下旬扩展到校外。在1966年8月9月10月，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在校内校外横行无阻。他们抄家、打人，杀害几千人，打伤无数。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沅芷的家，抄出了她的日记。陈沅芷1947年结婚。她的丈夫舒芜，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因此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歧视和侮辱。陈沅芷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些这类事情。红卫兵说日记中有“反动言论”，说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把她抓进学校。

象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自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

陈沅芷在“教育室”中被毒打。有一次，一红卫兵负责人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沅芷站在上面被“斗争”，然后把桌子推倒，使陈沅芷重重摔下。

陈沅芷被关在校中，与家人隔绝。1966年9月8日，陈沅芷被打死了。

陈沅芷被打死以后，她的丈夫被叫到学校里。他看到陈沅芷的尸体躺在砖地上，披头散发，脸上有血迹。红卫兵从外面押进来一个头戴高帽的人，命令他在陈沅芷的尸体旁边写“交代”，并指着陈沅芷的尸体威胁那个人说：“你要是不老实，这就是你的榜样。”

一红卫兵向陈沅芷的丈夫训话：“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绝食而死。”

火葬场的卡车从第二十五中学的后门开来收尸。红卫兵叫来了两个也被关在那里的第二十五中学的老师，和陈沅芷的丈夫一起把尸体抬上了卡车。随车来的火葬场的人一面向陈沅芷的丈夫收火葬费，一面说：“黑五类的骨灰，不许领。”

十二年后，陈沅芷得到了“平反”。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党支部和“北京东城区教育局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联署的《关于对陈沅芷同志实施的结论意见》说：“陈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1966年9月逝世。”这个《结论意见》的日期是1978年11月。

这是当时写这样的“结论”的公式和套话。

陈沅芷的死因，首先是红卫兵的抄家，当时普通公民失去了宪法写有的安全保障；然后，是以日记来作罪名。日记是私人的记录，并不示之于人，但是在文革中可以搜查日记并以日记作罪名。另外，罗织罪名都不经审判，日记上的话被随意歪曲解释。最后，造成陈沅芷之死的，是红卫兵的监禁和毒打。

纵容鼓励中学生用棍棒皮鞭和肉刑来处死他们的老师，这是文革的最残酷和丑恶的一部份。

当时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说，他曾在1966年夏日的一天，看到学校里廊檐下，有一个席子卷。他和几个同学好奇，过去用棍子挑开一看，是一具女尸，通体青紫发乌的颜色，非常可怕。他们不知道那是陈沅芷的尸体，还是被打死的从校外抓来的某个女人。因为当时也有校

外的人被抓进来打。另外，这个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外打死了一批居民。

在1966年夏天，第二十五中学的人，除了陈沅芷，还有一个男性校工被打死。关于他的名字，还没有找到记得的人。

~~~~~

【研究动态】

健全民族的记忆  
——文革研究资料编印纪实

• 亓冰峰 •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汉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研究的方向和范围也从偏重古典的研究转变为近代和现代的研究。这种转变当然是受时代演变和国际局势变化的驱使所致。冷战初期，本是美国和苏联对峙的局面。六十年代中国和苏俄交恶，世界局势从美苏对垒变成了美中苏三国演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外政策随之改变。重新认识中国受到朝野的重视，除了政府本身加强了中国研究的机制外，还有政府的大量资金流入高等学府补助中国研究，各大学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语文学系或课目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在学术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缺乏是当代中国研究最大的困难。1949年鼎革之后，中共在资料交流上实行锁国政策，禁止书报出口，西方国家只能从香港或东京的书商获得有限的资料，而且价格昂贵。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搜集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更难。文革使全国乱了套，很多事业都停摆了。就出版业而言，都在忙着印刷毛语录和毛选，正常的出版印刷几乎全部停工，又加革命小将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夺取舆论阵地，占据印刷厂，出版红卫兵小报和其它文革资料。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上半年，中国的出版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西方国家获得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来源也几乎完全断绝。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香港市面上出现了走私进口的文革资料。这些文革资料包括红卫兵小报、大字报、特别期刊、最高指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以及批刘、批邓、反苏修的专刊和揭发走资派的材料等等，正好填补了上述三年出版业的空白，给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留下了最珍贵的原始史料。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运动的发展。无怪乎凤毛麟角的文革资料一旦走私在香港市面上出现，不论定价多高，都是西方国家眼中的抢手货，不但民间组织如图书馆和学术团体争先恐后地抢购，而且官方机构也在搜集。

美国学术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如“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属下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主席 John M.H. Linbeck 和图书馆界负责人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博士等鉴于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缺乏和书商价格的高昂，倡议筹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搜集和复制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并以合理的价格向学术界提供。这就是1968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这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经费由基金会赞助，主旨纯系为学术服务。当时的基本构想是建立一个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集散中心，资料来源除该中心自身积极搜集外，全美图书馆、学术机构或个人获得当代中国研究的稀有资料时，都自愿提供给该中心，以便汇集与分散。该中心收到资料之后，复制一份，将原件璧还提供者，并附一份副本以作酬谢，或赠以等值的该中心自己的出版品以作交换。然后再按复制实际成本费用定价，在该中心出版的《通讯》上发表。这样，无论任何资料，一经该中心复制提供，全美甚至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可以按照成本价格获得此一资料，达到资料共享和

交流的目的，旨在促进当代中国的研究。

1967年夏，当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筹备接近成熟阶段时，获悉美国国务院有一批红卫兵资料将要解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便向国务院交涉，促其早日解密这批资料，以供中国研究之用，并请吴文津先生赴国务院鉴定这批资料，作出评估，看是否对中国研究有用。吴先生具有中国传统图书馆学者的素养，又有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专业知识，可谓学贯中西，对当代中国研究资料更是极为熟悉，他的评估会得到学术界的肯定。结果，吴先生的评估是这批资料对学术研究非常有用。国务院同意立即开始分批陆续将资料转交给学术界。国务院第一批解密的红卫兵资料交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次年夏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正式成立，设有顾问咨询委员会，由美国的东亚图书馆馆长和中国研究教授组成，吴文津先生是成员之一（以后委员会改组为董事会，吴先生任董事长至今），他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到的第一批红卫兵资料移交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此后国务院将解密的红卫兵资料直接交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三年之内全部开放，共10,000余页，包括小报，期刊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斗批改等专刊1,000多种。这批资料是以缩微胶卷的形式解密的，没有分类，也没有顺序。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到之后，复印成纸版，加以分类编订，定名为“红卫兵资料”，复制印刷，共计二十大册（11 X 16 3 / 4 英寸），于1975年春向学术界提供。这是在中国以外重印为时最早和数量最多的一批文革资料。由于文革资料的史料价值很高，在海外列为稀有难得的资料，弥足珍贵，出版以后广受学术界欢迎。中国研究资料中心遂将文革资料列为长期收集的主要项目之一，每至汇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即行付印，向学术界提供。于是在1980年和1992年分别出版了《红卫兵资料，续编一》及《红卫兵资料，续编二》，每一续编八册，各含红卫兵资料七十多种。

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对于文革资料的搜集，除了通过上述的交换计划以外，我也曾数次赶到中国访问之便，试想和有关单位建立文革资料的交换计划，但均未成功。因为红卫兵出版品仍是比较敏感的资料，无人也没有任何机构愿意负责此种交换计划。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文革资料搜集的来源多限于中国以外的地区。但这种僵局终于在九十年代末被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东亚图书馆员和学者们打破了。

1997年底，宾州狄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图书馆技术部主任和研究员宋永毅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从明尼阿波利斯的远东研究图书馆回来，看了他们的文革资料收藏，很不错。他同时又与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一起说服了该馆让中心出版，叫我务必去明尼阿波利斯与他们商谈具体出版事务。宋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看过他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学术和史料的书。当时他还有一本文革资料目录，正由吴文津先生为他校订并由哈佛大学协助出版。宋先生是研究文革的学者，他说那里的收藏不错，那一定没错。与此同时，本中心董事会成员之一王自扬先生和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朋友是旧识，也打电话给他们促成此事。

远东研究图书馆收藏的文革资料都是原件，有三分之一的小报都很完整或较为完整。譬如最具代表性的小报《新北大》220期，清华大学《井冈山》157期，北京矿院《东方红》136期等都完整无缺，这是非常难得的。在西方国家中，如此齐全的小报收藏实不多见。远东研究图书馆收藏的红卫兵专刊也不少，如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等，种类重复和不同的版本很多。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是为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收藏，与一些收藏家的收藏目的都不相同。我在明城住了两天，除看资料外，又和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朋友与周先生开了两次会，谈妥了出版条件。回来后给宋永毅先生打了个电话，商讨选印远东研究图书馆文革资料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由周先生主编小报部份，专刊部份则由宋先生主编，因为他自己收藏了很多，可与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收藏合并出版。我则负责出版事务、校订与印刷工作。

1998年4月，周先生把他编好的目录寄给我，不久，远东研究图书馆也把小报原件寄到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同时又把其他人提供的小报并入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收藏，定名为《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部份：小报》，由周原主编，于1999年夏出版，共二十大册，精装烫金封面，正式向学术界提供。

在进行复制远东研究图书馆的收藏时，宋永毅先生从一个加州东亚图书馆的朋友处得到一位加拿大收藏家李河先生写给他们的信和提供的小报目录，便与我提及可以考虑把李的收藏作为第二辑出版。其实李河先生与我们中心几年前就有过关于出让和复制这些小报的商谈，但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办成。我把经过告诉了宋永毅先生。宋先生表示他可以再试一试，或许李先生的情况和想法已有很大变化。他立即和李先生联系。在他的折冲之下，宋先生、李先生和我签订了一个三角联盟协议，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钱，宋先生出力，负责将李先生的收藏拷贝一份，再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付给李先生一笔合理的资料使用费，然后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重印出版。此事自协商到全部资料拷贝完成，历时三个多月，都是宋先生经手的，他的辛劳和运作是完成这批珍贵资料重印出版的主要关键。

由于这批珍贵资料的获得，使我们原先的出版进程起了变化，我们将出版专刊的日程推迟，先出版这批小报，由宋先生主编，定名为《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二部份：北京地区文革小报特辑》。但是1999年夏，当初步编辑工作将要完成时，忽然听到宋先生到中国研究访问时在北京被捕入狱，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震惊与反弹，我们的出版进程也因宋先生不能返美而搁置。所幸是年底他被无罪释放，我们的编辑工作才又继续进行。这批资料已于2001年出版，共40大册，包括李河的大部份收藏和其他人收集的少部份小报，共469种，约16,000余页。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李先生的收藏年限从1966下半年到1968年，正好涵盖了这段重要的时期。在上述469种小报中，有180种是完整无缺的，而在这些完整的小报中有150多种都是在1967年终刊的，这可能是受中共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的影响所致。其余小报大部份也都是比较齐全的，这是李先生的收藏中除地域性外另一显著特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 Andrew Walder 教授对这一批小报的出版特别重视。他是研究文革的权威学者，担任我们编委会的主席，捐赠了部份资金赞助出版，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也加速了我们出版的进程。

我们的工作还会进行下去。我们还准备出版各省市的红卫兵小报、文革初期大字报、中央首长讲话等等专刊。

目前中国官方对文革的评价是毁多于誉，但是对文革资料的收藏却不太重视，同时对于现在拥有的文革资料又认为牵涉的人事太复杂，太敏感，多不对外开放。虽然有些深受文革之苦的人如老作家巴金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研究文革，说真话，但也是孤掌难鸣。文革研究在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不会受到重视。相比之下，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研究文革方兴未艾，特别是八十年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们之中不乏研究文革的学者。文革研究在美国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将来在学术界蔚为大观也是可能的。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有系统地搜集、复制和出版文革资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作者简介：亓冰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史学博士。现任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主任。  
~~~~~

## 【史海钩沉】

谈林彪“一号令”

• 张云生 •

林彪在紧急备战期间发出的“一号令”，“九一三事件”后众说纷纭，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让我“实话实说”。

1969年3月发生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令全世界为之一惊。中国为了显示捍卫自己领土主权的决心和顶住“社会帝国主义”压力的气魄，不惜在这块弹丸之地部署重兵，并且派一大军区副司令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珍宝岛因这一场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而举世闻名。其实，这场战斗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在军事上的意义。

我注意到，林彪对珍宝岛发生的事情，从始至终都缺乏兴趣。我向他转报有关情况，他只是听听而已。

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又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林彪仍无任何响应。

“九大”召开前夕，苏联磨刀霍霍地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一副“大兵压境”的架势。内部情报资料不断显示，苏联高层有些“鹰派”人物极力主张乘中国正在发生内乱之机，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式的突然袭击，具体目标是摧毁中国的核实验基地（罗布泊）和一些主要战略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有的甚至提出动用核武器，以一举摧毁刚刚建起的中国核能力。苏联为了实现这一侵略野心，还派了一个名叫“路易斯”的间谍去与台湾的国民党勾勾搭搭，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助威打气。

这类动向，林彪听得认真，但无所表示。这大概就是他性格中的独特而又神秘之处。他似乎胸有成竹，轻易不露声色。

回想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与近日来出现的微妙变化，他的反应大都如此。

几个月前，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访。毛泽东主席接见时，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齐奥塞斯库作为既是苏联的“老朋友”，又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苏两国、两党的严重对立深感忧虑。他想当“和事佬”，奉劝中苏两党“停止论战”和对峙，以使夹在中间的“兄弟党”免受困扰。毛泽东把他的好意劝告顶了回去，并且说中共反修、反霸的决心不会改变，中苏论战不会停止，至少还要争论“一万年”。齐说，“一万年”的时间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说：“看你的面子，那就把中苏论战的时间减去一百年，再争论九千九百年。”毛泽东的一句戏言，被罗马尼亚客人看作是中国党想缓和中苏关系的一种姿态。齐问：“我可以把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转告给苏联方面吗？”毛泽东说当然可以，不过“九千九百年”不能再减了。罗马尼亚人把这一信息当作是他们此次访华的最大成果，特意在返国途中在苏联的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由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第二把手波德拉纳希亲赴克里姆林宫，将毛泽东“减去一百年”的承诺转告给了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罗马尼亚人是认真的，但中苏两党的领袖们对此并不认真。

过后几个月，即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连续发生了两次武装冲突，并以中国边防军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

于是，苏联的军方头领想对中国施行“核报复”的叫嚷甚嚣尘上，台湾的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他“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美国的箝制，他们才没敢动手。美国当时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它的头号宿敌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蒋介石的背后有美国在为他“反攻大陆”拆台，他勾结苏联重返大陆只是白日做梦。

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想发疯，也有人比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柯西金。虽然当时中国的上层把柯西金也当作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首领之一，但他实际上在中苏关系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战”。

珍宝岛的枪声一响，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担心如此发展下去，中苏两国的武力摊牌将不可避免。但局势一旦变得不可收拾，那将不仅给中国、也会给苏联造成严重灾难。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怕核威胁的；何况中国也有核武器，数量虽然有限，但给苏联的远东地区扔上几个，其后果也难以预料。更何况，西半球还有一个美国，中苏之间的两败俱伤，只能让山姆大叔坐收渔人之利。

柯西金这种求和怕战的心情，被中国的领袖们看得一清二楚。这应归功于总参三部的技术专家们，是他们采取特殊侦察手段，截获了柯西金通话的秘密。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话记录，分别上呈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我作为给林彪讲文件的秘书，知道它内容的时间比林彪还要早。

“喂，你是北京的电话总机吗？”对方用的是华语，但能听得出，他的口齿并不流利。

“我是北京。你是哪里？”

“我是莫斯科。柯西金总理就在我身旁，他想和周恩来总理通个电话，请你帮助接转一下，好吗？”

“柯西金？”

“对。”

“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叛徒！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的周总理通电话？”总机守机员毫不客气，手一抬，把电话线切断了。

对方又“喂，喂”几声，北京方面毫无反响。

接着，对方并不气馁，他通过北京的总机又接通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柯西金本人并未出面，而是让他的翻译用俄语要到了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告诉他去中国外交部，就北京电话总机守机员的“无礼”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请中国外交部转达柯西金想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

这一切，都由总参三部记录在案。

以后发生的事情，又使柯西金大失所望。苏联驻华使节果然约见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李连庆，又是提“抗议”，又是请示外交部协助让柯西金与周恩来直接通电话。李连庆用外交辞令作了应对。至于柯西金想与周总理直接通话的事，他认为苏联方面想与中国方面谈什么，最好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

总参三部记录件中所反映的动向，受到中国高层的重视。周总理对那位守机员的表现批道：“精神可嘉，做法欠妥，”毛泽东主席则批的是：“准备谈判。”

林彪听了我讲的有关情况后，只是微微一笑。

此时，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并由毛泽东几次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即将定稿付印。报告中点名批斗苏联“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泽东在最后审定时将“柯西金”的名字勾了去，以示区别对待。

“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冈山。这段时间内，他很少听秘书讲文件，至于可能发生的苏联入侵，他似乎认为并未迫在眉睫。

就在不少人严寒在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而眉飞色舞的时候，新疆塔城地区的过境却传来了有失“国威”、“军威”的坏消息。

1968年8月13日，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派出一个30多人的小分队去边境巡逻，巡逻地块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放牧草场。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对这块领土的主权一直有争议，为了显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又受到珍宝岛反击战的鼓舞，中国边防军对该边境的巡逻一直坚持进行。中央规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是，由于我方有关负责人的失职，也由于巡逻人员的麻痹轻敌，这支小分队落入了敌方预先设置的圈套。敌方不但埋伏了一个营规模的兵力，而且还动用了火炮、坦克和直升机。我小分队干部、战士虽然英勇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打得血肉横飞。

新疆塔城地区发生这场悲剧时，林彪正在北戴河避暑。我当时不在北戴河，因此对林彪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从不久后林彪悠闲地重游井冈山来看，他对中苏之间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并不怎样忧虑。他是指挥打仗的“大手笔”，对于边境上一场武装冲突死几十个人，在他看来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林彪对苏联没有多少好感。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先后两次去苏联治伤和养病，都给他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我给他当秘书四年，只听他提过一次苏联人，而且只是那么一句话。那是1966年国庆节后，我驻苏使馆向国内报告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情况。使馆反映，苏联高层对我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普遍感到难以理解。出席我招待会的官方代表仅是国防部副部长罗托夫大将，此人对我尚算友好，罗托夫私下对我使馆代办说，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看来很乱，但我相信中国同志控制形势的能力，能够控制住局势就好。我给林彪讲了这情况后，林彪说：“罗托夫当过苏联派驻中国的专家组组长，这个人我认识。”对于现在的苏联，他所知更少。

林彪看到了苏联的核威胁，但并不把它看得多么严重，因为他向来崇尚“人的因素第一”，也更信赖由他倡导、并已被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所谓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对正在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他由于长期脱离实践，几乎处于漠然无知的状态。但他在外敌面前，从来不缺少自信。

因此，在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观察上，林彪远不如周恩来那样敏锐和机智，更难以做到像毛泽东那样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这不是由于他缺少这方面的天才，而是他正处于外人难以想像的病态。

1969年8月底，我情报机关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甚至透露得更加真实而具体。它是这样写的：

“据可靠消息：苏联打算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的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一则报导是真？是假？抑或是美国想对付苏联而故意打出的“中国牌”？一些专家难以断言，但它确实帮助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绷紧了神经。如果说原来还对苏联的某些“鸽派”人物



有一丝幻想，那么此时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警觉和清醒。

中国高层紧急行动起来，研究对策，以防患于未然。

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主席去世。苏联本来已派出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到了河内，但柯西金听说周恩来总理到了河内，他想与周恩来“对话”的欲望又重新在心头涌起。为此，他取消了当天下午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安排，立刻乘专机飞赴河内。但当他的专机在河内机场降落之前，周恩来已飞回中国了。周恩来走后，中国新派来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对于柯西金正在扮演的角色，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充满怀疑。他的“微笑外交”大半可能是笑里藏刀，说不定就是苏联对中国进行所谓“外科手术式核袭击”前故意放出的烟幕弹。周恩来为了躲开柯西金而提前离开了越南，但柯西金想面会周恩来的愿望仍然如饥似渴。他参加了胡志明主席的国葬仪式后，仍然留在河内没走。他通过我驻越使馆转报我国，希望在回苏联时取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和周恩来总理会晤一次。我驻越使馆将柯西金的愿望及时报告了国内，柯西金急切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但他催问了几次，我驻越使馆的回答都是：“已报国内，尚未接到复示。”

柯西金想以苏联第二号人物的身份在北京降落并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这一举动，决非是仅属外交礼仪之类的例行公事。但他大概不了解中国的决策所必需的复杂程序：驻外使馆给中国外交部，外交部行文报给主持外事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需行文向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请示最后由毛主席拍板定案。这些必经的决策程序靠的又是传统的“手工”方式，如此辗转，两天的时间过去了。

毛泽东主席早有“准备谈判”的暗示，现在又看到了苏联方面有意探试中国虚实的机会，当即拍板同意：可以让柯西金途经北京，周恩来可以和他打打交道，但只限他在机场作短暂停留，不能让他走进北京城内。

我国最高层的复电传到河内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在回国途中。他等了一两天，仍不见中国的答复，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拔腿走了。

柯西金是从“南路”航线从莫斯科飞往越南的，他现在照原来的路线飞回去。先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领空，又经阿富汗，绕了半个圈子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这时他才得到回音：中国周恩来总理同意和他在北京机场举行一次会晤。于是他又绕道苏联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从那里直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贵宾室与周恩来举行了1小时40分钟的会晤。

会晤结束后，我外交部及时将会晤记录印成文件分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

我将会晤记录的内容要点讲给林彪听。会晤的气氛时紧时缓，双方唇枪舌战，但总的看是诚恳而友好的。会晤的成果是双方达成谅解：暂维持边界现状，尽力防止武装冲突，并就此举行一次副外长级的谈判，以求进一步解决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林彪听后毫无反应。给我的感觉是，他根本不相信苏联人的那套外交辞令，甚至怀疑柯西金是在带着“鸽派”的假面具，是想重温一年前苏联士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旧梦。

1968年8月的一天晚上，苏联的一架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场收到了这架飞机要求紧急降落的无线电讯号，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苏联的盟国，对“老大哥”的这种要求当然不会拒绝。机场打开了夜航导航灯，收音机安全降落。但从飞机上下来的并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即占领了机场。此后，又有数百架苏军飞机先后在机场降落。夜深后，苏军大批兵力向捷克纵深长驱直入，很快，就武装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后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指挥棒”。

一年前苏联演出的这一出丑剧，在林彪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大鼻子”的话说得再好听，他也决不相信。

临近196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大庆，林彪更是忙碌万分。一向怕风、怕光、怕这怕那的他，此时也都顾不得了。他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身兼责任很重的国防部长，他想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几十年不打仗了，他的手也有些发痒。

他经请示毛泽东批准，亲自主持召开了针对苏联可能进犯的“三北”地区（东北、华东和西北）作战会议。中国的三北地区背靠苏联，由过去的“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最前线。

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27军主力急调张家口地区，与早在那里驻守的第65军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

他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挂在毛家湾住地的会客厅。他站在地图旁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叶群忙前跑后，现从空军“抓来一个摄影记者将林彪此刻的身姿摄入了镜头。

林彪甚至还在住地练起了骑马。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出外“转车”回来，立即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林彪用急促的口气命令说：

“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立即到我这里来。”

我打过电话后，几员大将陆续来到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一般不让工作人员在场，这次则有点特殊。叶群对我说：“你负责作一下记录。首长今天要讲准备打仗的事，这是要立案存档的。”

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几员大将落坐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乐的时候，就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十月一日、二日、三日，一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

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林彪问大家：“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林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坚决照办。”黄永胜带头表态说。

“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吴法宪抢上来说：“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

其他几员大将都表示拥护林彪的指示没有谁再补充什么“措施”。

军令如山倒。当天深夜，吴法宪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在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上停留待命的作战飞机，除少数值班者以外，其余已全部转场，其它有关措施也已落实。

这天深夜，林彪又下一道既可笑又危险的命令。他让李文普给总理打电话，说为了防止因敌人轰炸而使水库决堤，他主张把京郊几个大型水库——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以及密云水库的水大部放掉。总理接到李文普的电话之后，当即表示反对。总理说，如果把这些水放掉，不用说一夜之间，就是连放几天也放不完。更严重的是，这些水下泻之后，将使附近的几十个县、甚至更多的地区遭到水淹，因此万万使不得。李文普把总理的意见转报林彪，林彪这才作罢。

但不管怎么说，林彪抓战备是认真的。他的举止有些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国庆期间平安无事，而林彪确实为它度过了几个难眠之夜。

节日一过，林彪决定视察张家口。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那里是当年平津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场，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那里的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林彪此行是绝对保密的。除了主席以外，他行前连对周恩来都未打一声招呼。

林彪动身之前，叶群忙着为此大作准备。一方面，她提前派出几个先遣人员到张家口，为林彪一行在那里过夜作食宿安排。另一方面，她让空军准备三架飞机待命。另外，由于张家口没有适合林彪坐的高级轿车，叶群下令从北京提前去一辆“吉姆”。

正式动身的这一天（10月5日），北京西郊机场戒备森严。上午8点，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时，除了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马卫华之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

在停机坪上，并列着两架“子爵号”专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我国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架专机。它是从英国进口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安全——据说它从出厂至今还没发生过技术事故。机身不算大，共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即便在飞行时一个发动出了事故，另三个发动机仍可照常工作，又比较安全，因此作为短途专机比较理想。此外，机场跑道上还停着一架苏造“伊尔—18”型客机，它是为林彪的一般随员和警卫人员准备的。林彪一行近百人，三架飞机也是满载的。

这么多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的处境最为奇特。这个人就是吴法宪。林彪此行的目的是“看地形”和检查部队的战备工作，与空军的事关系不大。与吴法宪有直接关系的是林彪乘坐的专

机是属于空军的，但已有一位空军的副参谋长（胡萍）专门负责专机的使命，再劳空军司令的大驾就属多余。外人很难设想，这里面有一段原委。这个主意出自叶群。叶群最担心的是怕林彪坐的专机出事，因此凡是林彪出行，叶群总是劝他多坐专列火车，而要少坐飞机。但林彪出于某种需要，又不能不依靠这个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这次视察张家口，时间紧迫，离开飞机更是不行。叶群为了确保林彪的安全，在想不出别的万全之计的情况下，就抓空军司令作“人质”。我听他不止一次地流露过：“只要首长和我坐飞机外出，必须拉空军的吴司令陪着。他必须对飞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一旦出了事，他也跑不了。”由此可见，吴法宪寄人篱下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怜而又可笑。

根据叶群的安排，林彪带上林豆豆坐上第一架“子爵”号，陪同的有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参谋长马卫华。叶群自己带着林立果，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叶群说，这样即便林彪的飞机出了事，仍可保证林家这条“根”不会断。

“林办”的工作人员也分乘两架“子爵”号。我和李文普以及林彪的内勤和8341部队的警卫值班负责人、负责专机服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都上了第一架“子爵”号。叶群的内勤、“林办”驻地的医生和部份警卫干部、随叶群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其余警卫人员则乘坐“伊尔—18”。

林彪座机上有两个工作人员负有“特殊”的使命。这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从空军报社临时调来的摄影记者。我的任务是记录林彪在途中的一切谈话，摄影者的任务是拍下林彪在视察途中的一切有意义的镜头。

“子爵”号的内舱，原来是个桶形，设有40多个座位。经过改装，机舱的前半部隔出两个单间：一个是工作间，另一间是卧室。工作间的一侧有个铺着白布的长方形的桌，两旁各有两个软椅；另一侧横放一个长形沙发。一路上，林彪一直坐在工作间里。郑维山坐在林彪的旁边，以便随时回答林彪可能提出的问题。吴法宪和我坐在林彪的对面，阎仲川和马卫华则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林彪乘坐的“子爵”号平稳地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后，另两架飞机也相继起飞，它们的目标是直奔张家口。

林彪的专机腾空后，很快向西转头，朝着延绵不断的太行山奔去。由于是看地形，飞行员受命把飞行的高度压得比较低，航速也比较慢。这一天又正值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因此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桥梁隘口、庙宇村落，从机舱的玻璃窗望下去清晰可见。林彪时而拿起望远镜朝下望望，摄影记者及时抓住机会，把他的神态拍入镜头。

除了飞机的马达声外，机舱内一片寂静。因为林彪不吸烟，其余人的烟瘾再大也只能忍着。林彪不引出话题，谁也不敢吭气。

“前边就是五台山吧？”林彪终于打破沉寂。

“是的。”郑维山用手向机舱下指了指。“那就是五台山。这一带，林副主席很熟？”

“走过，”林彪说。“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林彪说着，又拿起放大镜，在上边寻找他所关心的地名。

“这就是五台山。”郑维山指了指图上的一个标记。“我们的飞机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再往前飞，这就是雁门关。”

郑维山很健谈。他初次和林彪坐在一起，开始有点拘束，但当林彪把话匣子打开，他就

滔滔不绝了。他向林彪介绍这一带的地形特点，讲到一些有条件，也讲到一些不利因素，讲到入侵之敌可能选择的进攻方向，也讲到他对防御作战所作的部署和决心。他特别有兴致地讲起了他所提倡的用步兵打敌人坦克的一种战术，声称敌人如果敢于用坦克群在他所防御的地带贸然来犯，他有决心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来无回。郑维山年过50，但精力充沛。他的口音既有南腔，又有北调，但很好听，也很好懂。他的口齿流利，讲起话来既精练，又有说服力。他没读过多少书，但在几十年的带兵生涯中，不但提高了军事指挥才能，而且练就了一个军事指挥员所难得的口才。一路上，经五台山过雁门关，再到张家口，往往是林彪的只字片语，就能引出他的一套宏论。在平时，林彪是不大喜欢一个下级在他面前这样侃侃而谈的。但今天，尽管郑维山喧宾夺主，并使他身旁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副总长阎仲川无暇张口，但林彪并无反感。郑维山像连珠炮似地倾述着自己的一些军事见解，林彪一直在洗耳恭听。

林彪大概是在有意观察和考核郑维山，而郑维山却向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案。林彪于是又改话题，进一步问郑维山的战斗经历。原来郑维山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自幼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和杨成武手下的一名爱将。

林彪又问郑维山：“你过去指挥过哪些大的战役？战绩如何？”

郑维山有些羞怯地回答说：“我指挥过的战斗很多。参加过平津战役，我直接指挥的最大战果是歼敌五万多。”

解放战争后期，郑维山仅是华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作为一个军级指挥员，他的战绩也算不俗。但在林彪面前，他确实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转瞬间，张家口到了。

林彪的专机在张家口机场降落后，驻在当地的65军杨军长和贺政委前来迎接，并用车把林彪一行送到了预先安排好的住处。这里是一座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后面是一个宽阔的大院。它装潢朴素，设施简单，当时作为张家口市政府所管的“交际处”，是当地接待宾客的一流建筑。条件低劣，好在林彪对此并不挑剔。

林彪从飞机上下来后，一直兴致很高。他在中午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在当天下午接见附近驻军的师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接见分成三批：第一是接见驻张家口的65军的军师两级主要负责人；第二批是接见驻延庆的27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第三批接见降了格。空军在张家口有几个“543”地对空导弹营，和陆军的军师“老大哥”相比，这些营级“小兄弟”只是个基层战斗体，但林彪对空军的重视远远高于陆军，因此它们的负责人也得到了面见副统帅的机会。每次接见，都由吴法宪、阎仲川和郑维山作陪。接见一开始，先由林彪问一问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哪里人氏、多大年龄以有关战备的一些情况，最后再由林彪就战备工作作些指示。

被接见的部队干部，特别是两个军的师以上干部，难得有一次和副统帅兼国防部长当面交谈的机会。因此他们趁着林彪讯问“部队有什么困难”时，就纷纷提出一个他们共同感到苦恼的问题：“怎样正确处理一好和三好的关系？”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倡普遍开展创造“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运动。在罗瑞卿任总长的总参谋部和肖华任主任的总政治部的具体推行下，这一运动在头几年搞得有声有色，对于部队基层建设的加强和战斗力的提高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林彪于1965年提出“突出政治”以后，“四好”运动就越来越变形，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并且使军政干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嘴上空唱高调成了时髦，埋头搞军事技术工作的却被批判，部队的战备工作和基础建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说是“创四好”，实际上是“突出”了所谓“政治思想好”，又怕被人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这个问题，部队干部人人关心，经常议论，

但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解决不了，这下林彪亲自来了。虽然在大首长面前说话总难免有点拘束，但人们还是鼓起勇气向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而在林彪看来，“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怎么会成为问题呢？他明明讲的是“创四好”，并没说只创“政治思想好”，他还曾讲过要以“一好带三好”，而不要只抓“一好”而丢了另外“三好”。他确实这样讲过，但下边执行起来却只有“突出政治”。据说，“突出政治”是“一突百通”，而“冲击政治”是“一冲百空”的。这些只是少数“先进典型”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经验说起来好听，照行起来颇难。这样，有少数部队领导干部越弄越糊涂。不“突出政治”不行，但不抓好战备和训练，又怎么行呢？

面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林彪置之一笑。他说：“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也是政治。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

林彪讲话，郑维山代表他的下属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林彪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他稍感疲劳，早早地休息了。

但精力充沛的叶群，却不肯轻易放过仅有一宵良机的张家口之夜。天色刚过黄昏她就让吴法宪、郑维山两员大将陪着去逛当地的百货商店。这时，商店已经关门点货，但因为“大人物”驾临，只好又破例将门打开，叶群等人进了商店，街上一些过往的群众也跟着拥而进。他们也跟叶群一样，并不是真的想进商店买什么东西，而是各有所好。叶群不过是招摇过市，借机露面以显显威风，而跟进来的人们不过是想看看热闹。

“是叶群！”人群中有人高喊。

“是叶群！”又有人附和。

这几声惊叫，立刻把附近和游人和商店的工作人员都吸引过来，把叶群、吴法宪和郑维山围得水泄不通。随同叶群等人前来的8341部队警卫人员一时难以打破这堵人墙，只能暗中叫苦。

“还以为大家认不出我，但还是被认出来了。”叶群眉开眼笑地对着人们说。她拿出《语录》本，举在空中挥动几下，高喊：“我代表林彪同志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人群中发出一些掌声。有人带头高喊：“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又有人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这是空军的吴司令！这是北京军区的郑司令！”叶群又把她身边的吴法宪、郑维山介绍给大家。她紧接着又带头高喊：“向吴司令学习、致敬！”

吴法宪也举臂响应：“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吴法宪胖得像个阿弥陀佛了。他在平静时，两只眼睛已被脸上肌肉挤得十分犯狭小，而现在，由于过份激动，嘴上的唾沫再配上含着报恩之情，使他显得更加可笑。

叶群和吴法宪互相吹捧，在人群中引起一些掌声和笑声。

这场闹剧，不得不收场。警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终于设法把叶群等人护送出百货商店上了汽车，返回住地。

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参谋刘吉存是这场闹剧的目击者。他回到住地就对我大发牢骚。“真不像话！主任给我们讲，首长这次来张家口是严格保密的，叫我们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她出去在群众场合这样大喊大叫，保什么密？谁还能保证首长的安全。”

次日下午，林彪一行返回北京。

林彪的张家口之行，使他对西北方向的地面防务稍感放心。但此时主要威胁是来自北面方向，而且主要是来自空中，而非地面。

在当时，我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完全抵御敌人空中攻击。至于对手搞的核讹诈，当然吓不倒站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但来自敌方的可能核袭击，也不能掉以轻心。

林彪听讲国际动向，特别是苏联军方动向的兴趣，比过去明显增加。我这个“讲文件”的秘书也感到责任更重了。

我党中央对当时苏联方面的真正意图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管中苏两国总理的九月会晤已被中苏之是展开关于维持边界现状谈判的具体日期和双方代表团的组织级别取得了共识，但谁都不能不担心这是苏联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放出的烟幕。以库兹涅佐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之日，就不定就是苏联对中国动手之时。

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时间已经确定：1969年10月20日。10月20日，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最感到吉凶难卜的一天。

当然，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把形势估计得这么严重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谁也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当作儿戏。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中苏谈判展开之前，将大部份中央一级领导人疏散到南方各地。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16日至于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毛泽东去了武汉。

林彪去了苏州。

朱德、李富春去了广东。

陈云、邓小平去了江西。

聂荣臻去了河北省邯郸。

叶剑英去了长沙。

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

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

未雨绸缪，无可厚非。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了江苏省苏州市。

我奉命陪林彪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我们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十米。这所大院，听说“文革”时是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分南北两个大院，我们住的是南院，警卫部队住在北院，南院的房子还有一些，那主要是为原来这里的工作人员办公所用。

林彪住下后，当务之急是保障通讯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林、叶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

“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我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18日下午5时许，内勤进来向我传话：

“张秘书，首长叫你去一下。”

由于刚来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我还拿不出充裕的时间去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可能是要我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我进去后，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他见我后，停下脚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示意我作下记录。我坐下了，他仍然站着。他像往常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名地口述：

“一、……；

“二、……；

“三、……；

“……”

他一供口述了六条。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他说：“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我。

“记下来了。”我说。

“再念一下。”

我照念一遍。

“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

“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处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

“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

我去的叶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条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一眼，对我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



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故意绕了个弯子，然后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

我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

“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

“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

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一零一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

“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

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

“什么建议？我想听听。”

叶群重复了我说的两条意见。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建议，大概叶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议的份量，也显示一下她在林彪面前的份量。

“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

“再压多久呢？”我问。

“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我抓起电话机，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到北京的黄永胜。总机说，黄总长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我让总机把黄的电话接过来。

我对黄永胜说：“林彪同志对部队当前战备工作有六条指示，让我传给黄总长，请您记一下。”

黄永胜答应一声：“好，我马上就办。”

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

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意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

的时间不会比我晚。

林彪传出“六条”指示后，北京的黄永胜怎样向下传达的，我毫无所知。这一期间，我作为林彪身边唯一的秘书，从未接过黄永胜本人的任何电话。黄永胜与叶群的热线一直不断。在黄永胜眼里，与一个秘书打交道是不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一号令”曾被认为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和“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而受到连篇累牍的“批判”。“四人帮”把持的舆论工具这样别有用心地胡说八道，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人云亦云，他们说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出“一号令”，是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下边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么“态度”和“感情”，林彪更想“一箭双雕”。既想借“一号令”作一次“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又想假“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朱德、陈云、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去，由此推理下去，当然也把刘少奇惨死在河南开封和陶铸惨死在安徽的责任也都推到了林彪的头上。

这不是历史，因为它不是事实，而是故意捏造的“历史”。

事实是：据我观察，林彪为防止苏联借谈判之名对我实施突然袭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口述的那六条，核心内容是部队要紧急“疏散”。疏散到哪里去，怎样疏散，他并未具体过问。命令发出后，他一直在注视着苏联方面的动静。10月20日那一天，他让我与总参作战部取得不间断的电话联系。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不是运载什么谈判代表团的，大半可能是携带空降兵或核武器的不祥之客。因此他吩咐我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我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我国首都北京。我是一步一报。是听得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的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事实是：林彪发出“六条”命令（所谓的“一号令”）以后，我军各部队（主要是驻“三北”地区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后不久，敌人方面也相继进入了同样的戒备状态。据情报消息，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我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已呈现剑拔弩张之势。在战云密布的紧气氛之下，似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我作为国防部长的值班秘书，此时在精神上感到一种压力。一方面，我感到我这个角色的份量确实不轻。林彪委托主管军委日常工作，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处于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要地位。他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适当，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是否了如指掌。然而他现在远离北京，远离毛主席，远离总部的作战参谋机构；他既不看文件，又不亲自接电话。唯一能够帮助他掌握一些情况的，就是秘书值班室直通北京的电话。这电话机是由我守候的，一旦因为我值班贻误了情报的传递，就会酿成大患。另一方面，我整天和各种情报资料打交道，这些资料不能全盘端给林彪，只能经过我的判断、选择、分析和综合之后，扼要地讲给林彪听，可是我的军事素养和现代科技知识水平又很差，怎么能保证工作中不出误差呢？

我怕误事，决定将这些忧虑报告给叶群，看她说应当怎么办。

“我看照现在这样下去，很危险！”我对叶群说。

“危险什么？”叶群惊奇地问。

“现在爆发战争的迹象很多。苏、美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台湾的蒋介石都想乘机动手。对方的真正企图是什么，现在还弄不清楚。要真的敌人先动手，我们肯定要被动挨打，吃苦头。”

“你根据什么这样说？”

“我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首长是国防部长，现在远在苏州，什么情况也不能及时了解，怎么指挥打仗？”

“他不了解情况，就得怪你们。”叶群盯着我说：“你们秘书给他讲文件，报情况，误了事我就找你们是问。”

“我知道的情况，就是及时给首长讲，也已经晚了几天了。我的情况主要是来自林办留在北京值班的秘书。情报部门把情况报给总参作战部，作战部报告毛家湾，毛家湾再报苏州，我再报告首长。这样一辗转就是一两天了。苏联的飞机从蒙古起飞到北京用不了一两个小时，打导弹只要几分钟；而首长一两天后才了解情况，这不危险吗？”

“那你说怎么办？”叶群也没主意了。

“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我想起码应当保证情况传递的准确和及时。为了及时，最好减少中间环节。总参作战部向首长反映情况，再不能只靠文件传送，更不必经过毛家湾的值班秘书转来转去，而应有一个总参作战部和苏州这里直接联系的渠道。我的意思是：总参作战部应当把重大的敌情动态及时用电话传给苏州。”

“这样可以。”叶群立即表示同意。“你打个电话给总参的阎仲川，让他们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分秒不能误。你还可以告诉空军情报部，让他们也及时向苏州报告情况。这样双管齐下，情况就来得更及时。”

“我还有一点建议。”我继续向叶群叫苦：“在苏州值班的秘书只有我一个，我又不懂军事，这付担子使我感到有压力。”

“这不要紧。”叶群说，“你一个人不够，再从毛家湾调一个来。”

“我们办公室的几个秘书都是政治干部出身，没有一个军事上的内行，现在是抓战备的紧张时期，林办秘书中最好能调来一个懂军事的。”

“这不必要。”叶群把我意见顶了回来。“首长过去指挥打仗，从来不依赖秘书。现在就是再调一个将军来当秘书，也用不上。”

不管怎样，由于开辟了几条掌握敌军动向的渠道，我作为林彪抓战备工作的一耳目，感到心中的压力减少了。各方面的情况，每天源源不断地从总参作战部、空军情报部和北京的“林办”值班室传到苏州来。这一下，我这个值班秘书可真有事可干了，要记录频频打来的电话，要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还要看从北京每一两天就送来的一批文件，要天天几次给林彪和叶群讲文件、讲动向，还要处理杂七杂八的零星事务，忙得团团转。不久后，叶群又从北京把于运深秘书调来苏州增援，情况才稍好了些。

林彪对我讲战备方面的情况，听得比较认真，而叶群对这些枯燥无味的情况罗列缺乏兴趣。她又让我打电话给北京的阎仲川副总长，让他选送几份香港出版的报纸给苏州，目的是想开开眼界。过后不久，总参作战部送来四种香港报纸，每种都是厚厚一堆。它们是《大公报》、《文汇报》、《晶报》和《香港时报》。我选了几张给叶群过目，她刚看上几眼，就吓得“呀呀”直叫，原因是报纸的不少版面都有蛇的图案。从此，叶群与那些港报再无缘。

紧紧张张只是一阵子。几天之后，林立果从北京来到苏州。一天，他跑到秘书值班室。闲谈时，他向我发议论说：“我看这个仗打不起来。我们搞紧急备战，苏联也搞紧急备战。很可能是双方摸不清对方的意图，都担心对方先动手。”

我曾以为林立果的这种议论只是小孩子之见。但后来看来，他的这一见解也不无道理。从苏联的战略动向看，它关注的重点还在欧洲；它在边境外对我搞大兵压境，无非是想对我施加

压力，但若真想对我发动进攻，兵力明显不足。至于美军，它在侵越战争中已经陷入泥潭，欲打无力，欲走又不甘心。远东美军和太平洋舰队进入全面戒备，可以看作是一种守势，而我方在苏美耀武力之时，加强战备体制也是必要的。

林彪本人大概也明白了这一点。敌人的紧急战备，可能是对我军紧急战备的一种反应。

林彪对于紧急备战的热情渐渐凉了下來。仅仅一周过后，他对听讲这一方面的情况，逐渐失去了兴趣。

我军各部队根据林彪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已经有一月有余。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形势也趋缓和。但是这时正值入冬季节。部队的处境又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北部几个军区的部队，有的野营在外，有的散在民间，有的隐蔽在战备工事里，有的据守在深山隘口上。部队的给养、运输、训练、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果确实处在战时条件下，环境比这再艰苦，指战员们都会像当年的红军和“老八路”那样，坚持忍受。但是现在并没有更加迫切的需要，让几十万兵员在外边挨冷受冻。因此，人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疏散逐渐感到不可理解，有的甚至感到厌倦，各种“活思想”也随之增多。

对于这种情形，我根据各军区来电反映的实际困难，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

“部队可以回营了。”林彪表示不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

林彪真是大处抓得住，小处不爱管。在他看来，部队的疏散之权由他掌握，何时收兵回营就是各军区自己的事，至多由军委办事组发个通知就够了。但各军区是根据副统帅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的，上边不发话，他们不敢擅自作主。

我对林彪解释说：“部队是根据首长的命令疏散的。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部队回营的决定。”

“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叫他们研究一下。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

林彪表态同意，这是件好事，但由于叶群的阻挠，又使部队的上百万指战员在野外多受了苦。叶群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

在关键性问题上，叶群在林彪面前当大半个家，这次又是这样。

按理说，在形势已明显变缓的情况下，停止部队疏散本用不着再由林彪去发什么命令。作为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此作出相应的安排。事实上，后来的收兵回营乃是下边自主作出的决定。军委办事组不“办事”，此乃一例。

林彪发布“一号令”的背景和经过，如此而已。说它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说它是“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更是欲加之罪。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疏散外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的决定，并由周恩来、汪东兴具体经办的。在10月16日、17日实施，而林彪发令是在10月18日。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 作者曾任林彪机要秘书

~~~~~

## 【学术争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阶段  
应该界定在1966—1969年恰当

• 颜智华 •

笔者对史学界在新中国的历史阶段的分期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划定成十年（即1966—1976年）的结论不敢苟同。如按社会主要矛盾及政治斗争的焦点；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的主要两大社会派别；开展斗争，即冲突的主要形式和手段等特征来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期界定在1966—1969年较恰当。

主要理由如下：

### 一、从社会主要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来看

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至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69年4月1日—24日）为止，该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别依附于“两个司令部”的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的矛盾。

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后来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是准确的。由此开始，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开始由“前17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中共政权与“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和对他们进行斗争逐步转变为“两个司令部”和在政治上分别依附于“两个司令部”的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的矛盾和斗争。

但该文件内容属于高层机密，还为“革命群众”所不知，因此，毛泽东和刘、邓（即所谓两个司令部）的矛盾和冲突还未公诸于社会，冲突仅仅局限于党内高层，即还未由此扩大形成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批判，基本上还是继续沿着中共老一套阶级斗争的套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老一套阶级斗争的套路是指：如“四清”运动，尚未搞的全国半数以上的单位还在搞或者将要搞。社会矛盾的焦点仍然表现为“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制定）、“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1963年9月制订）和“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制定）所阐述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内容形式表现为：

（1）在城乡基层单位，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包括政治上的压迫，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体罚及物质分配上的歧视等）。

（2）在上层建筑领域，是对资产阶级学者专家（包括党内的学者）的批判，理论上的，即思想领域。

（3）在体制和制度建设方面，中共党的主要工作是在基层单位整顿和强化党委的领导，在农村特别强调重建在大饥荒时期近于崩溃的阶级队伍；突出政治；割自1961年夏开始死灰复燃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如在农村，清查农民自留地的面积，严禁超标准多划分自留地；严禁弃农经商（指农民买卖农产品牟小利，非现在的经商概念）；严格劳动管理制度；分配上进一

步平均主义化。在城市企业，取消或者减少职工的计件工资制度和奖金，强调义务劳动等。

中共把与“地富反坏右”的“阶级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一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贫下中农也喜欢“三自一包”，农村里中共党员干部心里也明白“包产到户”比“农业集体化”生产搞得好，但这一普遍存在的“民心”倾向，官方的理论和教科书（包括文件）一是违心的否定，并认为仅仅是“中农阶层”的阶级属性。前一个方面的矛盾是显性的，公开的。后一个方面的矛盾是“隐性的”。

当时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被打倒10多年的已经成为“死老虎”的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着变天复辟”，用这一“学说”支撑起来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政策和按政策对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们的专政，掩盖和淡化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特别是农村，贫下中农获得的主要是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惠，使其成为极左路线得以推行的阶级基础。

把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颁布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就在于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焦点的变化。即再也不把革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死老虎”）的命作为最主要的政治斗争任务，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又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毛泽东这一新的思想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也由此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其一。

## 二、形成了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派别（社会集团）

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社会派别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文革初期，即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到同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前，运动基本还是按老的政治运动的模式进行，没有脱离“领导整人，群众挨整”的基本框架。政治形势的根本逆转是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未公开）和随后公开向全国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会议时间8月1日——8月12日）后逐渐开始的。特别是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革命群众（除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外，都叫革命群众。）开始大分化，并重新进行新的组合。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旧有的阶级队伍发生分化，原来固定（划定）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结构和等级秩序被破坏；同时价值观念（政治观点）相同的人群之间相互进行新的组合。即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两派以对待党政领导干部（多是指单位负责人）的看法和态度的截然不同而划界。“保皇”一派成员多是红五类或者红五类子女，一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红人（统称17年的红人）；“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有红五类及红五类子女也有非红五类子女（包括黑五类子女），也有少数是17年的红人、但绝大多数还是在平常被领导压制、歧视、排斥甚至打击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受压挨整”的部份青年学生和教师，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员和青年工人等。

造反派的总指挥部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单位负责人（单位的领导机构也是政权的一部份——政企未分）。后来文革结束，有人把文革中“阶级关系及其斗争”通俗叫作“文化大革命是整过去整过的人”。“17年的红人靠边站，17年受压的要掌权”等。当然概括的并不十分准确，造反派中的头头一般都由红五类及子女担任，在文革以前的政治运动中多数没有受压的经历。家庭成份高的人都回避当头头。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群众中力量对比往往是一边倒——造反。

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中，从未出现的一种全新的“阶级组合”。这是其二。

### 三、采取从未有过的斗争形式和手段

（1）、广泛的群众性。在大中城市，卷入运动的包括所有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教师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党政机关的干部（非领导职务）及部份市民。

（2）、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后来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真枪实弹。还长期停课，停工。

（3）斗争的战场主要摆在大中城市，后来才延伸到农村。与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在农村完全不同。

（4）还有，就是该运动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单位，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表现出非常大的发展不平衡性和性质上的差异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之前的运动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斗争和被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即斗争一方是掌握了强大的专政工具的国家，被斗争一方是手无寸铁的“自然人”。

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独特的特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冠以“史无前例”的定语。

如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开始的标志，则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收场的信号。因为运动搞到此时，预定的任务基本完成，该斗的都斗了，该批的都批了，各级地方政权和基层单位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中央委员会也通过“九大”的组织程序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贵们大都进入了各级政权班子。但文革运动的结束应该划定至1969年底。因为这一场运动的几大特征，从1969年底，1970年初才基本消失了。

第一项特征自不必多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已经达到，所说的这场政治斗争中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存在。

重点谈第二项特征的根本变化。“九大”召开半年之后，即同年底到1970年初，原运动中形成的对立的两大社会政治派别从组织上已经解体，并且逐渐又重新按阶级出身划线进行新的组合。导致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1）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社会阶层，大、中学校学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复存在，大学生毕业分配了，中学生被整到农村当农民去了。

（2）在运动中形成的所有群众组织都解散或者瓦解了。

（3）形成了新的阶级组合。新的阶级组合是怎样形成的呢？

#### “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该运动是为否定和消除文革运动的后果及影响而设计和进行的。有“秋后算帐”的本意。或者说是社会政治形势的重新逆转。

从该运动进行的方式，依靠的力量，打击的对象等内容来分析，其性质基本上是镇反，土改，反右，四清等老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老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的简单的重复。

至于运动在斗争的形式，运用的工具和手段上，与文革有很多相同的，象大字报、大会批斗、逼供信、关押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通行和惯用的，非文革独创。文革中采取的很多极端作法，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鸣锣游街示众等都是从包括“湖南农民运动”（见毛泽东《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内的中共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仿效的。

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显得秩序井然。文革运动的三大特征,特别是前两大主要特征都不复存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从1970年延续到1971年“九·一一事件”(林彪坠机)为止。

之后,直至1976年“四人帮”被捕的几年中的社会政治斗争,在内容上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斗争的延续,但由于参与斗争双方的人员的社会构成,斗争和冲突的具体行为方式,社会矛盾的焦点等特征与1966—1969年的三年差别太大,因此,把1972—1976年这四年划为“文革”时期也是不恰当的。比如说,毛泽东在1965年1月制定的《二十三条》中就明确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也贯彻了这一思想,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文革“的历史阶段提前吧?这两者是一个道理。

因此,把1970年以后至1976年的7年划为文革阶段是很不准确的。

关于文革中表现和呈现出来的社会多元文化及深远影响问题

把文革定义为“文化大革命是整过去整过的人”。这是对《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核心精神的归纳和概括。但由于我国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教育、文化还有交通及信息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这就必然呈现出运动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之间;大中城市和小县城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运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性(甚至是巨大的)。还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和不同的社会身份,角色的人的个人感受和遭遇的巨大差异性。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文革中表现和呈现出来的社会多元文化”。

例如:当1966年底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被造反派公开批斗,大权旁落的时候,但边远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们在县城里的权威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大中学校的“黑五类”已经“大解放”了,但县城和农村里的黑五类(都指子孙后代)还是阶下囚,从精神和行动上仍然默默的偿还父辈(或者爷爷一辈)欠下的“孽债”。盲目服从,奴隶主义和血统论在大中城市里被批判,但在农村基本未被触动。武斗在一些地方很残酷,但也有较平静的地区。

后来把发动文革的责任抽象归咎于毛泽东;把文革中群众批斗“走资派”这一行为的责任具体归咎于“两个反革命集团”。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新中国自建立到1966年为止,整个17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各种错综复杂的甚至包括非常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来了一个总爆发,象火山一样。如把这场运动看做一场灾难,一场浩劫,但作为历史现象,这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讨论和研究“文革”这一历史现象,不能把它与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割裂开来,就象不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整个国际共运史割裂开来孤立地讨论研究一样。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场运动本身加速了否定左的路线的进程,使改革提前到从1979年开始,这就是文革这一历史现象的积极方面的意义。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吕青(加拿大)

《CND》总编: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